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王寅丽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王寅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王寅丽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8305-9

I. 汉… II. 王… III. 阿伦特, H(1906~1975)-哲
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0966 号

责任编辑 张玲雅

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王寅丽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223,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305-9/B·696

定价 30.00 元

序 言

王寅丽的博士论文即将作为学术专著出版。对她个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她从作硕士研究生时起就开始研究阿伦特,陆续发表过几篇有关阿伦特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还曾在中国台湾出版。但这些毕竟只是她目前这部论著的准备,或者说只有本书才能较为全面和集中地体现她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来她这部书的初稿在2005年就已大体完成,当时参加评审的专家大体上也已给予肯定,但也有专家认为最好能把没有完成的第三章写完,尽可能更完整一些。考虑到她是在职博士研究生,不存在及早毕业找工作的问题,推迟一些时间答辩对她不会有不利影响,因此我也倾向于她适当推迟。正好这时她以本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获得批准,她自己更觉得应当争取尽可能把论文写得充实完整一些。这样答辩就延迟到2006年。在后来的这一年中,她除了完成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教学任务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修改补充这部书稿。在2006年进行的通讯评审中,本文得到了参与评审的专家相当高的评价,在答辩会上更被专家们一致评为优秀。因此,本文现在被挑选出来出版可说是意料之中的事。

为一部专著作序,大多是对书稿的内容的评介,但也可以是就相关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考虑到本书作者对阿伦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

都交代得相当清晰，文字表达也较为流畅，全书篇幅又不大，即使没有研究过阿伦特的读者，也不难通过阅读这部书来了解阿伦特。其实作者为本书写的摘要就已勾画出了阿伦特思想的概貌。我在此再来具体谈论阿伦特的思想显然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是画蛇添足。还不如借题发挥，就如何对待阿伦特这类西方现代思想家的理论谈些看法。

从整个西方哲学视野来看，阿伦特的地位当然远不及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家，与她的老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也有较大差距。但阿伦特毕竟是西方学界公认的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没有、也无意构建出由某种核心概念所主导的系统的政治哲学，但她的著作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关于极权主义、革命、自由的本性、思维和判断能力、政治思想史等广泛的论题，而这些都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和政治所探讨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她都从历史和理论层面作了独到的反思，寻求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作为一个犹太裔思想家，她与海德格尔的亲纳粹立场明显不同，但她一直保持着与海德格尔的联系，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对她产生过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但她同时又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尼采、雅斯贝尔斯等人的一些思想因素。由于她的理论中有这些不同的思想因素，她也反过来对具有不同理论倾向的当代西方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倡导社群主义的麦金泰尔、强调主体际性观念的哈贝马斯和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就都从各自的角度援引阿伦特。这当然只是说不能简单地将阿伦特归入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潮或流派，而不是说她的理论是各种不同思想的堆集，没有统一性和连贯性。事实上，她所关注的问题(例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都是从不同角度牵涉到人的政治活动。哲学对存在的研究在她那里主要也表现为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本性的研究。把对抽象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沉思转化为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性质问

题的探讨,可以说体现了阿伦特理论活动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也正是企图超越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界限的西方现代哲学家所共有的。这种超越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都企图由往往被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转向现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生活世界。就政治哲学来说,就是由传统政治哲学的观念结构转向对各种现实的政治事件的具体的反思。阿伦特也正是在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方法的影响下,把对各种现实的政治生活问题的反思看作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她对上面谈到的她所处时代的极权主义、革命等现实问题的探讨当然存在片面性,她的许多看法在西方哲学和政治学界经常引起争议。但是,不受抽象的和绝对化的一般概念的约束而关注对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本身的反思却使她对这些问题的真实意义的研究能更为深刻和具体,能给人更多的启示。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超越传统的政治哲学的突出之点,也是阿伦特能在西方思想界产生广泛和深刻影响的主要原因。总之,我认为,在评价阿伦特等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时,不能局限于他们是否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不能只看他们的理论是否符合我们所主张的原则,还要看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现实的问题是否作出过求实的、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后一点也许更为重要。至于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具体的是非成败,我在此不拟、也无法展开谈论,建议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仔细阅读王寅丽在本书中所作的评介。她对阿伦特关于人作为思想的存在和行动的存在、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对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所作的分析,对阿伦特政治哲学中行动、公共领域、世界等基本概念的评介,特别是对阿伦特晚年回到哲学的分析,都很有见地。当然,她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她至少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具体材料,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思考。

我还想就阿伦特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说几句话。

阿伦特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些错误的

批评。例如,她扭曲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并由此加以否定。尤其严重的是:她在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把纳粹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把斯大林的确存在的错误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对阿伦特的这类扭曲和错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给予严肃批判和揭露,与之划清界限。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把阿伦特这类西方思想家简单地归结为与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之所以要提到这点,是因为这类过去曾相当盛行的非友即敌,甚至非己即敌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已逐渐为学界大多数人所摒弃,但也仍为少数人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坚持,其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消除。最近几个月,有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专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和对西方现代哲学的评价问题连续给我写了十几封信,其所坚持的观点正是几十年前曾流行的这种非我即敌的观点。在谈到西方现代哲学时,似乎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没有其他内容,更谈不到积极的内容。我对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愿望并不怀疑,但对他不能与时俱进、仍然停留于几十年前的僵化立场感到悲哀。因为坚持这种立场不仅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反而会严重扭曲并损害马克思主义。虽然像这位专家这样僵化和对西方现代哲学无知的人在中国学界现在已很少,但他们在这方面的不足毕竟说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所是、如何全面评价西方现代哲学家们的理论仍然是有待继续研究并取得进一步共识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既需要有深刻的综合研究,也需要有具体的个案研究。后者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没有个案研究的基础,一般的理论研究就会苍白无力。但个案研究中也关注理论分析。在对西方学者的理论作个案研究时,应当尽可能分析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王寅丽在研究阿伦特时虽然重点是阐释阿伦特本人的观点,但她没有回避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问题。她既把阿伦特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揭露

了阿伦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例如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扭曲),又不对之简单否定,甚至还指出了阿伦特在批判“现代性”等问题上与马克思的共同之处。当然,她在这方面的工作也许还不充分,但毕竟已作出了一定努力。如果大家能重视个案研究并关注一般的理论分析,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能有效地提高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

刘放桐

2007年4月15日

目 录

序言	刘放桐	1
导言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阿伦特		1
一、反思极权主义		3
二、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11
第一章 “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 ...		25
一、城邦政治中两种生活的统一		25
(一)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25
(二) 言和行的统一		32
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		37
(一) 柏拉图:真理和意见的对立		37
(二) 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影响		45
(三) 基督教的反政治性		52
三、现代的思与行		55
(一) 科学革命与“制造”观念的产生		55
(二) 制造:从自然到历史		63

(三) 历史:“不朽”和“过程”	68
四、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75
第二章 阿伦特的政治存在论	87
一、行动和公共领域	89
(一) 劳动、工作和行动的现象学考察	89
(二) 自然和世界	101
(三)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110
(四) 自由和权力	118
二、对阿伦特基本概念的比较性检视	123
(一) 马克思:劳动和工作	123
(二) 海德格尔:制作和行动	131
(三) 女权主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142
三、世界的失落与重建	148
(一) 行动和世界的关系	148
(二) 世界异化	152
(三) 两种权威,两个传统	157
(四) 公民文化和教育	165
四、反思美国革命	171
(一) 社会问题	172
(二) 宪政主义	177
(三) 政治权威的重建	182
第三章 精神生活的政治意义	198
一、无思想的“平庸恶”	198

(一) “回到哲学去”	198
(二) “根本恶”和“平庸恶”	201
二、思考活动及其政治意义	212
(一) 精神生活的规定	212
(二) 在时间中的思考	215
(三) 真理和意义	219
(四) 苏格拉底的典范及问题	224
三、判断的政治意义	228
(一)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	231
(二) 康德的审美判断	237
(三) 回到旁观者的判断	252
 结语: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阿伦特	 266
一、共和主义的复兴	266
(一) 对“共和国”的本体论重构	268
(二) 公民德性	269
(三) 宪政自由	271
二、政治哲学的界限	275
(一) 政治思考的非知识化	276
(二) 传统断裂的承当	279
(三) 后现代的政治责任	281
 参考文献	 285
后记	294

导言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阿伦特

在 20 世纪的政治哲学领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她对当代政治思想作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在二战结束后她最早全面反思和系统分析了“极权主义”概念;她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政治概念,把被西方人长久遗忘的行动和公共领域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从而奠定了对现代的一种持续审视和批判的方式;她对革命、宪政、民主和权力的思考已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资源。同时,她又是一个思想和行动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她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截然区分,在“审美政治”和“审议政治”之间的徘徊,都成了政治学、后现代哲学、女权主义等不断争论的话题;而她 1971 年出席以色列对纳粹头子艾希曼的审判,写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道》,更是将自己置于了风暴的中心。这本书引起争议的直接原因是她的“平庸之恶”概念直指纳粹政权下普通人的政治责任,乃至犹太人对自己同胞命运应负的责任;理论上,“平庸之恶”概念提出的邪恶的无思想特征,部分是她前期行动思想的转向,也重新提出了思与行的关系问题,晚年她更深地考虑了精神生活——思考、意志和判断——对于政治实践

活动的意义。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常常被归为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包括西塞罗、孟德斯鸠、联邦党人和托克维尔，同时她也受到她的两位导师海德格尔和雅斯尔贝斯的影响。但她在二战期间不平凡的个人经历和她特立独行的精神境界，使她有意识地拒绝传统哲学的体系化方式，坚持“仅仅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1]。事实上，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论文都是对当代重大经验的敏锐思考，特别是《论革命》，完美体现了时代之思的切近与深远的魅力。以上这些方面都造成了我们难以对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有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把握，甚至哲学追求的“系统”、“整体”正是阿伦特所激烈反对的。作为当代公认的政治哲学家，她宁愿被称为“政治理论家”^[2]或“政治作家”^[3]，也有意避免“政治哲学家”或某类哲学家这样的称呼。在 1964 年联邦德国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君特·高斯对她的访谈中，她说：“我所要避免的‘政治哲学’这一表达极度承载了传统的负担。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我都认为在哲学和政治之间，即在人作为思想的存在和行动的存在之间，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张力。”^[4]她一生的经历可以说就是哲学和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写照：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上台，阿伦特被迫走出哲学的象牙塔投身政治，1951 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奠定了她作为国际知名的政治理论家的声誉。接着，对极权主义起源的探索把她引向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政治批判，1958 年《人的境况》的发表使她步入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的行列。但在参加完艾希曼的审判后，她却从她一直关注的政治领域转向哲学，明确表示要“回到哲学去”^[5]。因此，从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乃至近代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中透视她的思想，就不仅能全面地理解她的政治哲学，而且能较为深入地思考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

一、反思极权主义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汉娜·阿伦特是个聪明勤奋的哲学学徒,一心想照着哥尼斯堡的伟大同乡——康德的榜样在象牙塔里度过一生,在马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学习为她打下了德国哲学的深厚基础,就在那个时候,她和后来的许多著名哲学家一样,经历了海德格尔带来的“思想的风暴”。1933 年纳粹上台之后,她开始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并在柏林做地下营救工作,成功地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在经历了短暂的被捕并机智逃脱之后,她逃到了巴黎,在流亡巴黎的七年时间里一直活跃于巴黎的反纳粹抵抗运动和犹太人政治流亡者团体。1940 年巴黎沦陷,阿伦特在韦斯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段时期,侥幸逃脱后来到纽约,赤手空拳地在美国奋斗了多年。我无意过多地强调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并不一定跟他或她的民族或个人遭遇有直接的关系,阿伦特也和许多政治思想家如以赛亚·柏林、罗莎·卢森堡一样,都不喜欢强调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不过,阿伦特却和纳粹有过直接的战斗,有更切身更可怕的经验,纳粹上台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是对其思想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此后她一直在试图理解,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自诩高贵的欧洲文明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要知道,20 世纪 30 年代前她对政治没有丝毫的兴趣,她大学时的同学,犹太哲学家汉斯·约拿斯说:“从 1929 年以来,很清楚人们必须面对的是法西斯主义的高涨。最令我惊讶的是我的老朋友汉娜·阿伦特成为政治科学中的人物。这实质上是希特勒的功劳,在那以前她还是鄙视政治领域的。”^[6]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创造性地对“极权主义”从概念上加以思考,并探索其起源的伟大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这部著作

都十分适合她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定位。此书分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主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说明为什么犹太人单单被挑选出来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对象；二是解释极权主义产生的起源；三是说明极权主义发展的逻辑。在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中，阿伦特分析了犹太人——这一没有政治共同体而漂泊无根的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千百年来生活在异国他乡，犹太人努力使自己同化到所在国家中，但他们一直不被允许进入除商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在民族国家发展的早期，由于国际金融借贷的需求，大量犹太人以金融掮客的身份在各国政府间发挥影响力，地位迅速上升。但作为整体，犹太人从未培养起政治意识和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形成对政治现实漠不关心、被动反应的习惯。他们要么成为新贵，要么成为贱民，实际上始终处在政治社会之外。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帝国主义的扩张，犹太人失去了商业上的影响力，分化成一群有钱而无权的个人。拥有财富而无政治行动能力，这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成为仇恨对象的主要原因。同时，在长期隔离于共同世界的状态下，犹太人开始把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思考为自然天性和种族根源的差异，强化了上帝特选的意识。这种自我解释造成了一种更加复杂的隔离状态，产生出反犹主义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反犹分子关于种族差异的宣传与犹太人对自身历史的解释并无根本不同。因此，在阿伦特看来，20 世纪的政治危机将犹太人驱赶到各种政治风暴的中心并非偶然，犹太人由于自愿隔离于公共世界和缺乏行动能力，对自己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帝国主义”这一部分，阿伦特分析了帝国主义以经济利益为主旨的扩张运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破坏，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造成了大量的富余资本，同时产生了大量破产的贵族、农民和失业工人等。帝国主义时代，两个多余力量——多余资本和多余劳动力（暴民）——结合

起来向海外殖民地扩张,国家充当了扩张运动的保护人。结果一方面破坏了有一定疆域和宪政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摧毁了人权和法治的政治传统,从而一切驱逐、杀戮都成了可能的;另一方面毁掉了国家间的道义与和平,造成强权即公理、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资本主义无休止的扩张剥夺了个人用于生活需要和确定身份的私产,并把私产转化为无限流动的资产,最终造成了“无世界”的“大众”(mass)。与帝国主义初期的“暴民”(mob)不同,“暴民”还多少分享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价值标准,虽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而“大众”则是完全失去了一切阶级联系,纯粹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体的纽带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亦不能从与他人分享世界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孤独、恐惧、绝望、无力,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大众的这些特点正是极权主义赖以形成的群众心理基础。因此,极权主义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目的意识形态和它“退回到部落社会的运动”吸引了大众,使他们得到一种追求有意义目标的归属感和最低限度的尊严。在“帝国主义”一章中阿伦特还提出了著名的人权悖论:在近代宣称人权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条件下,人却只有属于政治共同体才能得到真实的保护。没有公民权,人权就是空洞的,实际上人权的不可剥夺性质,只有在大批多余的、不受国家保护的人突然现身在欧洲民族国家的边界时,才被人们意识到。当这些失去国家保护的人退而依靠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时,才发现没有任何政府或制度愿意保护他们。

在分析了欧洲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当中与极权主义产生有密切联系的因素之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作了概念的规定。她特别强调极权主义的“前所未有性”,即不能把极权主义混同为历史上不绝如缕的暴政或专制形式。她以孟德斯鸠的从基本特性来定义政体的方式,定义了极权主义的基本特性——意识形态和恐怖。通过这两方面的高度结合,极权主义达到了对人的自由的彻底根除和对人的全面统治,而

在这之前,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暴政,都是用暴力手段消除人的政治自由,但并不连私生活的自由也彻底消除。极权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断的运动”,它并不以某个个人或某个阶级的独占的利益为目的,实际上极权主义的目的不是任何的可理解的特殊利益目标的实现,而恰恰是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运动过程本身。它从一种虚构的意识形态出发,所有的行为都服从于无休止的运动的逻辑,而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不顾一切有限的局部的利益——经济的、个人的、民族的、军事的,只追求一种无限遥远将来的虚构的目标。这一前所未见的政治体制能在20世纪中叶产生并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必要前提是资本主义疯狂扩张造成的社会政治环境和道德心理基础。阿伦特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20世纪出现的两种政治形式: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奠定了阿伦特在政治学界的独创性地位,但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感到它是一个过于庞杂、难以归类的作品,既有社会、政治的分析,又有观念、思想史的分析,而且“起源”这个题目似乎也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它并没勾勒出极权主义在20世纪产生的一条或几条“起源”,只是提出了与极权主义产生有联系的众多因素。更成问题的是,她十分牵强地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归为一类,但现代社会出现的孤独大众这一点并不适合于斯大林主义产生的背景,因而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性力量构成了挑战。

不过她在现代公共领域的丧失与极权主义的兴起之间建立的关系仍然是清晰一贯的:首先,资本主义的崛起造成了政治的工具化和公共世界的衰落;一方面经济活动冲破家庭的狭小范围,为流动的资本服务,“公共”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对言说和行动的共享”,而变成私人利益的共同性,古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退化为经济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内在的运动性打破了传统、习俗、宗教、道德的